

编者按

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民族地区部分贫困民众存在内生性动力不足问题,制约着外生性赋能的有效实现。结合所在高校在民族地区的教育扶贫实践,本文作者发现提高农村母亲家庭管理、家庭教育、家风培育、就业创业等方面的能力素质,是民族地区教育扶贫的关键。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应以赋能母亲为重点,切中贫困要害,回归教育本源,加强农村家庭建设,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实现乡村振兴。

■ 廖鸿冰

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民族地区部分贫困民众存在内生性动力不足问题,制约着外生性赋能的有效实现。2018年12月,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乡村振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2018-2022年)》,强调发挥高校优势,助力民族地区构建高效完善的教育精准扶贫体系。根据所在湖南女子学院在怀化会同县、溆浦县、永州双牌县等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教育扶贫的实践,笔者发现提高农村母亲家庭管理、家庭教育、家风培育、就业创业等方面的能力素质,是民族地区教育扶贫的关键。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应以赋能母亲为重点,切中贫困要害,回归教育本源,加强农村家庭建设,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实现乡村振兴。

认知性潜能:强化价值引领,增强脱贫致富信心

脱贫致富需要挖掘贫困民众的认知潜能,促进他们深化认知,树立脱贫信心,增强行动自觉。思想上“扶志”,能力上“扶智”,充分挖掘本地民俗文化特色亮点,以文化熏陶激发“动力源”。

一是强化价值引领,用文化带动教育扶贫。民族地区民族文化形式丰富,影响深入。但随着人口和信息交流的加速,迷信邪教侵入。有些民众特别是中老年母亲将家庭贫困问题归咎邪教迷信,导致贫困加剧。

针对这一现象,民族地区扶贫工作既要保护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要强化价值引领,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增强民众的思想文化辨识度。应丰富宣传教育形式,成立思想扶贫宣传队、文化艺术表演队和社会工作服务队,实现思想扶贫到家、党恩教育到人、家政服务到户,带动当地民众参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主动意识。

二是发挥妇联引导作用,激发农村母亲致富动力。发动农村基层妇联组织、“妇女之家”充分运用多种媒介,以群众愿意听、听得懂的方式,向妇女群众广泛宣传党和政府扶贫开发、乡村振兴政策精神和惠民措施,树立和宣传自力更生脱贫致富的先进妇女典型,能引导贫困农村母亲增强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意识,催生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在实现自身脱贫致富的基础上,教育子女、带动身边、辐射广大贫困群众积极主动脱贫。

内生性潜能:育训结合,实现就业创业脱贫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扶贫的思想,发挥学校教育助力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智力优势,湖南女子学院以对口扶贫的民族地区县为主阵地,开展育训结合,积极助力民族地区贫困人群依靠技能实现就业创业,带动稳定脱贫。

一是探索女性人才培养规律,招收民族地区学生,培育脱贫致富的内生力量。在招生时面向民族地区贫困考生倾斜,近三年湖南女院在怀化、张家界、湘西共招收260名少数民族学生。在教学中对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与妇女事业发展,培养新时代高素质女性人

才;引导女性与家庭成员共同促进家庭和睦与下一代健康成长,增强家庭发展内生动力;培养立志扎根农村妇女事业和家庭建设教育的专业人才,为提升未来农村母亲素质提供人才支撑。

二是以就业为导向,开展就业创业技能培训。依托扶贫政策培训项目,深入民族地区,举办各类工作坊,可提升农村母亲家庭管理素养与就业创业技能。近三年湖南女院为民族地区女性养种植技能培训3期约150人、礼仪形象讲座1期50余人、女性健康讲座1期50余人、广场舞教学1期50余人;同时还选派专业技能强的学生驻扎民族地区,专题种养殖培训3期,引导农村母亲增强劳动光荣的观念,提高自我发展能力。

三是以民族文化为引领,发展文化产业,实现民族文化传播与创新。民族地区有着丰厚的文化资源。湖南女院在对口扶贫地区注重挖掘江永女书文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侗锦织造技艺文化,以民族文化品牌为引领,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实现民族文化传播创新及经济价值转化。同时协助民族地区加大“非遗”文化开发,与相关单位深度合作,带动当地发展乡村旅游产业。

外生性赋能:坚持外联内育,构建乡村振兴的社会支持系统

在充分利用国家支持政策的同时,湖南女子学院积极争取政府部门支持,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聚焦民族地区脱贫协作,不断链接资源供给和输入,合力推动民族地区贫困人群脱贫攻坚。

一是实施校社合作,开展实地调研,为脱贫攻坚献计献策。借助基层社会组织、“妇女之家”等丰富触角,湖南女院组织各层面专题调研,深入了解脱贫攻坚中农村家庭建设现状,特别是了解贫困家庭中母亲家庭管理能力与素养状况,了解农村母亲在家庭建设中的独特作用,倾听她们的心声,为党和政府精准制定推动农村母亲发展、促进家庭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的政策和财政投入提供科学依据。

二是实施校农合作,促进贫困群体增产增收。依托农村专业合作社,建立“校农合作”基地。在充分考虑农户得实惠的基础上,本着双方共赢原则,湖南女院推动对口扶贫相关单位优先采购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形成校农合作的产业扶贫工作机制。就对口帮扶的岭头村来说,该村贫困户共73户,贫困人口234人,目前已脱贫71户,脱贫230人,仅有2户4人未脱贫(无劳、残疾、智障等原因)。

三是实施校政合作,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为了加强民族地区妇女干部队伍建设和高层次女性专业人才培养,高校应推动学校与民族地区政府达成战略合作协议,以推动民族传统文化的挖掘传承与开发利用、现代服务业的转型发展与旅游资源的有效开发。充分发挥高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转化和产业创新中的综合优势,推进地方与高校产、学、研合作。

(作者为湖南女子学院社会发展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家庭内外：女性题材影片应具备更宏大的创作视野

——由电影《关于我妈的一切》引发的思考



· 阅读提示 ·

母女关系在近年来影视作品中越来越多地被讲述,一定程度上是女性意识不断成长的表征。电影《关于我妈的一切》提供了国产电影关于母女关系议题的新视角,同时也表露出值得深思的创作问题:除了塑造并赞美女性为母亲、姐姐、女儿等家庭身份之伟大外,还应看到更多在家庭或爱情关系之外,踏入主流社会秩序之后的职业女性故事。

■ 陈亦水

母女关系在近年来影视作品中越来越多地被讲述,一定程度上是女性意识不断成长的表征。近期,由赵天宇执导,徐帆、张婧仪、许亚军等主演的母女题材影片《关于我妈的一切》在各电影节展上初绽锋芒。影片提供了国产电影关于母女关系议题的新视角,主要表现在现实生活的细节真实,以及母女关系的情感真实这两个层面,同时也表露出值得深思的电影创作问题:女性形象塑造应超越家庭关系,走向更宏阔的社会视野。

细节真实的中国文化情感结构

影片《关于我妈的一切》讲述了中学老师季佩珍,在退休之际被诊断出恶性肿瘤后,人生最后半年里发生的故事。本片较为可贵地呈现了大量现实生活细节,并成功地缔造了母女关系的情感真实,这主要得益于创作团队前期的调研努力。

作为北京国际电影节暨第28届大学生电影节开幕影片,导演赵天宇在开幕式上表示,故事的很多细节来源于对43对母女进行的深度访谈,为该片的叙事提供了极具现实感的素材。

例如,主人公季佩珍对于女儿李小美的过度关心,体现在满满一年的特产与蔬菜、翻看垃圾箱和卧室抽屉猜测女儿恋爱情况,以及蒜茄子、勾手指童谣等真切存在的地方生活习俗,甚至还有我国1980—1990年代青岛气象局的南极科考职业梦想等,这些源于现实的细节描写,既再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又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方城市发展的历史痕迹,从而缔造出一个充满细节真实,又独属于中国文化情感结构的现实故事。

情感真实的母女关系塑造

影片从女儿的视角与叙事口吻出发,通过一个罹患绝症的退休教师,展现了女性在生活中所承担的责任及个人情感表达,这主要体现在母亲季佩珍的人物塑造与母女关系的处理上。

首先,一只硕大的风向探测气球飘过季佩珍家的厨房窗户,电影叙事由此打开,也将观众的视点引入了季佩珍的生活。原来,曾经身为青岛气象局年轻职员的季佩珍,曾一直向往成为南极科考队队员,却因婚后怀孕而放弃南极科考梦,转而成为一名中学地理教师。整部影片最后一个镜头,则是一只风向探测气球覆盖摄影机镜头与观众视点,标志着季佩珍永离人世。

探测气球作为核心道具的首尾呼应,也引出了最关键的母女对话:女儿问母亲,为了自己和家庭选择现在的生活是否后悔?母亲回答道,从未后悔过,因为这是一代人的个人选择,但希望女儿不要像她一样,而应该走自己的路。

这种将女性放弃理想归于“个人选择”的情感逻辑,和此前上映的《我的姐姐》中主角安然和弟弟

相濡以沫的行为逻辑如出一辙,即每当需要牺牲个体追求的命运降临时,女性总以“个人选择”的解释,化身为母亲、妻子、姐姐等诸多家庭关系意义上的崇高身份,从而自我合理化地解决了个人与命运的矛盾关系。不过,《关于我妈的一切》最后仍然留给女儿李小美如何“走自己的路”的可能性空间。

起先,李小美的事业与爱情之不顺,源于她潜意识里对于母亲“望子成龙”心态的拒绝。选择做一名电视台节目组里的无名之辈,身处“第三者”位置的无望地下恋情,都是她在下意识以自毁的叛逆方式选择自己的生活。

随着母女关系的矛盾激化,尤其是经历了开车误入桥下死路这一剧作结构上的“灵魂黑夜”之后,母亲的绝症情节反而成为母女关系的强行“释然剂”,小美也因此看清了事业和爱情的真相,最终辞去编导工作而成为一名南极科考船的随行记者。

李小美的结局,既表明了她的内在精神成长,也表现出女儿对于母亲未竟心愿的象征性继承。母女关系的塑造背后,有着强大的亲子心理和情感逻辑支撑,可以说是近年母女题材影片中颇为成功的处理之一。

讴歌女性如何脱离家庭身份定位

但是,一旦脱离母女关系,进入家庭关系乃至社会关系中,女性身份又该如何定位呢?

影片里的季佩珍,始终被定位为好媳妇、好姐姐、好妻子等诸多家庭身份,男性角色得知季佩珍罹患绝症后的情感反应,仅表现为丈夫眼中的“再没有人给我做饭了”,季佩珍与弟弟的和解也仅在于,姐姐绝症之后弟弟收到她留下的巨额卖房款后的感动……这种极具依附性关系的客体身份定位,尚不如故事里塑造的另一名女性、季佩珍的肿瘤病友刘玫。

影片里胃癌四期的刘玫,是一名充满阳光的成功企业家,在预感大限将近之际,她回到火锅店亲自掌勺,颇具仪式感地炒了一桶火锅料,用蜀音对着周围充满敬畏眼神的店员大喊:“我刘玫要是不在了,这味道不能倒噻!”

而就在刘玫高光时刻的叙事段落结尾,创作者还是给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反打镜头:刘玫和季佩珍烂醉如泥地从车上下来后,丈夫和女儿立刻搀扶着季佩珍,刘玫用羡慕的眼神看着眼前的和睦家庭,最终孤身倒下,走向生命尽头。

关于女性之于家庭与事业的矛盾关系,主创团队固然无意给出答案,但该片的确暴露出女性题材电影创作的核心问题,即讴歌女性的方式,如何可能脱离妻职、母职等家庭身份定位,进入女性之于自身、时代甚至家国历史的主体性身份表达?

事实上,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十七年”时期,不乏《刘胡兰》《党的女儿》等关于女性英烈前辈的革命叙事,再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第五代”导演黄蜀芹的《人·鬼·情》之于女性经验与历史寓言的精湛书写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脱离了传统家庭关系,而具备更宏大的创作视野。而今年的宏大叙事电影创作里,例如国庆档“拼盘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中,唯一试图将女性写入家国历史的仅有章子怡导演的短片《诗》,但这远无法体现上一代中国妇女社会贡献的分量之重。

由此,希冀我国女性题材的电影创作,除了塑造并赞美女性为母亲、姐姐、女儿等家庭身份之伟大外,还能看到更多在家庭或爱情关系之外,踏入主流社会秩序之后的职业女性故事,以及她们对这个时代的伟大贡献,这既是对妇女,也是对过往历史的尊重。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仲英青年学者”)

《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与女性教育赋权》

作者:杜声红 何爱丽

教育是女性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前提。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她们广泛参与到劳动领域中,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通过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陆续出台的多项政策和相关数据,本文作者认为要厘清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与女性教育赋权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需要认识到女性从“能上学”到“平等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为什么需要接受教育以及接受了什么样的教育的问题;另一方面需要认识到教育赋权以后,女性在经济社会中的参与和发展情况。

来源:《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

《生育政策调整下年轻父母的工作家庭冲突——基于全国十二城市的调查》

作者:李芬 风笑天

从独生子女政策、二孩政策再到三孩政策,生育政策的调整引发了社会各领域的“蝴蝶效应”。本研究在生育与性别比较的双重视角下,重点考察了生育政策调整过程中年轻父母所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及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从多维度剖析了其影响作用机制。同时,基于我国的现状,对三孩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反思,并就家庭友好政策及其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提出了启发性建议。

来源:《广东青年研究》2021年第3期

《以女性为载体: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中的礼制抗争与人性追求》

作者:王均霞

顾颉刚的孟姜女研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时代思潮的产物。从士大夫塑造的知礼的杞梁妻到民众塑造的纵情任欲的孟姜女,该研究体现了顾颉刚对旧礼制的批判和对新道德的追求。在其交叠的叙述中,女性成为其批判旧礼制、传达新道德的载体。一方面,民众被塑造成与士大夫阶层相对的、未受礼制熏陶的、富于情感的人,是中华民族依然保持着活力的象征,而女性作为民俗学者眼中最多情的群体,又成为民众的代表;另一方面,女性被塑造成封建礼制的牺牲品,是“奴隶的奴隶”,因而,女性的生存状况便成为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将女性从家族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赋予其自由平等的人性便具有了正当性。

来源:《民俗研究》2021年第5期

(范语晨 整理)